

从贺拉斯诗集说起

——西方古典校勘学里的汇校、判断和订补

刘皓明

在西方古典学中,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校勘学的基本操作便已经规范化了,后世学者往往将这种规范化了的校勘操作规程称作拉赫曼方法。这种方法包含三大部分,它们彼此之间呈一定的前后顺序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近十年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两位西方古典诗人的研究上,一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二是古希腊诗人品达。相关成果将在今明两年内发表。今天我在这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两位古典诗人作品翻译与研究的心得。

2004年我为《读书》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因为篇幅较长,所以拆成两部分先后刊载,分别冠以标题《从好言到好智》和《从夕国到旦方》(后收入拙著《小批评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耶鲁大学东亚系的荣休教授傅汉思(Hans Fraenkel)去世,所以其实是篇追思纪念文章。傅汉思出身于一个德国犹太裔学术世家,祖父、父亲和舅舅都是西方古典学名家。《从好言到好智》回顾了他的家学渊源,也就是西方古典语文学;《从夕国到旦方》讲西方古典语文学的传统如何通过傅汉思等人进入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汉语学界,我的那两篇文章,特别是前一篇,大概是对西方古典语文学——特别是德国传承的近代古典语文学——最早的介绍。那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十五年过去了,今天在中国,特别是在很多年轻人那里,古典语文学俨然已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学科。但是围绕着这门学问,特别是它的核心部分之一——文本校勘学——则一直存在着神秘化现象。有感于斯,今天我在此将要以贺拉斯和品达的文本为例,对西方校勘学的基本方法做个简明扼要的说明,再结合中国校勘学的传统和现状,分析一下中西校勘学各自有何优劣之处,又有何值得彼此借鉴和改进的地方。

西方校勘学发轫于西洋古代晚期,即从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学者勘定荷马等希腊经典作品开始,经过中世纪的断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勃发,待到公元18世纪末,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19世纪上半期,则全面成为一个方法严格、程序规范的学科。众所周知,任何文本校勘工作的具体细节,都要涉及书写(书法、书写规范,例



拉赫曼

如横写或竖写等等)、印刷、书写和印刷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文本传承历史与状况等种种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更毋庸说,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特质——在西方古典学中主要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言文字特质——在其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然而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也没必要去触及诸如字母书法的形态(古文字学、金石学)、卷本的形态、书写所使用的物质材料等等这些因文明传统和历史时代不同而各异、在东西文明之间缺乏普遍适用性的、主要存在于文本校勘工作前期阶段的技术性领域,而是想更多谈谈校勘学中能够跨越语言文字传统从而具有更普遍意义的东西。

我们前面提到,在西方古典学中,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校勘学的基本操作便已经规范化了,后世学者往往将这种规范化了的校勘操作规程(die historisch-kritische Editionspraxis)称作拉赫曼方法(Lachmanns Methode),用一位对建立这一套规程作出突出贡献的19世纪上半期德国古典学和日耳曼学学者的名字(Karl Lachmann, 1793—1851)来命名。这种方法后来尤其通过Paul Maas所著的校勘学小册子《文本校勘》(Textkritik, 1927初版, 1950年增订版)而规范化、固定化了。这种规范化了的校勘操作包含三大部分,它们彼此之间呈一定的前后顺序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具体地说,这三大部分即是汇校(recensio)、判断(examinatio)和

订补(emendatio)。我们下面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三个组成部分是如何在实际校勘工作中得到运用的。

先说汇校(recensio)。

在当代以及前辈中国学人对中国古籍校勘的实践中,汇校工作的通常做法是,把能搜集到的不同版本(如果不是孤本的话)放在一起比对,以检出其中的错字和异文,在校记中罗列出来。但是在西方,19世纪上半期以来拉赫曼等人建立起的程式化汇校方法,则不仅是要把存世文本的各种古抄本并置、发现其中的异文错字这么简单,而更是要通过检查各种抄本中所包含的舛错来判断各个抄本之间的传承关系。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古典学者们认识到,文本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舛错依照其校勘学上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判别舛错(erroses separativi)”与“判同舛错(erroses coniunctivi)”。通过考察不同抄本中出现的舛错,我们可以推断古抄本A和古抄本B之间是存在着转抄关系,还是说彼此独立,抑或是彼此独立但倘若追溯其原本的话其实同出于一源。

我用“舛错(erroses)”一词来统指文本中所有可能出现的“错误”。错误具体考察起来,则可以归为好几个不同的类别:在中西方校勘工作中,所能遇到的文本传抄乃至翻印错误包括:脱、衍、颠倒、误置乃至误改、擅改等几类舛错。而在西方古典学者看来,对各类错误的具体考察和分析尤其有助于揭示抄本之间可能存在的从属关系。因此在汇校的同时,也必须对各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定,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平行地对勘。在西方校勘学里,在汇校这一阶段,作为操作程序之一的对各本之间关系的判定也已相当规范化,例如:若B本抄自A本,则A是B的范本,用图表示为:

A
|
B

倘若二者都存世,则B本

于汇校而言没有价值,应自汇校中淘汰(eliminatio codicum descriptorum)。

若A与B被判定抄自同一范本而其共同的范本今已不存,则通过比较A与B中的舛错,可以推定曾经存在过一个二者所本的原本,这个推定存在的原本用希腊小写字母 α 表示:

α
A B

A与B重合的部分就是传世文本,相异之处则为异文。倘若存世抄本有更多种,不止上面展示的A和B两种,则各个存世文本之间有可能存在多层次的转抄关系,例如可以有这样的衍生关系:

α
A β
B C

这幅图在校勘学上称作抄本流传枝干图(stemma codicum),它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了各种有校勘学价值的存世抄本流传的过程,而考察存世文本、从中推导出这样一幅或若干幅枝干图,便是西方古典校勘学中汇校阶段工作的核心。

在这幅例图里,罗马字母A、B、C分别代表存世的三个抄本,而希腊字母 α 和 β 分别代表我们通过A、B、C中的判同与判异舛错所推定存在过的两个范本,只是它们已经散佚了。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存世的A、B、C和推定存在过的散佚范本 α 和 β 之间,从流传过程阶段上讲,并非是一种二级关系,而是存在一种更为复杂的三级关系。具体地说, α 是已知所有文本的总源头,而无论存世的A和被推定存在过的 β 都直接出自 α 这个总源头,只不过A我们今天还能看得到,而 β 则已经散佚了。B和C则位于传承过程的第三级,据推断来自位于传承过程第二级的 β 本。于是在这幅抄本源流枝干图中,就出现了两个依据推导而被判定存在过的已佚文本,而这两个已佚文本之间又存在前后传承关系,在西方古典校勘学中, α 就被称为原型



贺拉斯像

(Archetypus),而 β 则被称为次原型(Hyparchetypus)。

要反映某部古代作品的古抄本的实际流传过程,我们这里提供的这个简单模型往往需要扩展甚至倍增,比如可以有这样的情况:据推断,现存抄本不止有一个原型,或者说不能确定是否曾存在过一个共同的原型,而且不仅作为已知原型的文本已经散佚,所有由此算起的二级抄本,即可视为次原型的抄本也都已散佚;而属于每个已知原型的各现存文本来源于不止一个次原型,它们中有一些甚至彼此曾经发生过混合,而不是始终保持了各自传承的独立性,等等。在古典校勘学的实际情形中,这里所描述的扩展了的抄本流传的复杂模型其实非常接近近代学者对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集的古抄本流传过程的刻画。

19世纪中期以来,主要是德国的古典学学者们对传世贺拉斯诗集所有有校勘学价值的古抄本作了全面的汇校。贺拉斯诗集现存抄本大约有250种,其中有全集,有别集,也有全集或别集残本。这中间有校勘学价值的算下来约有百种。将这200多种存世抄本逐字比对、校勘,剔除其中无校勘学价值的抄本,在有价值的抄本中发现并分析其中所含舛错的同异,再据此清理出彼此之间的传抄流传关系,此外还参校以古代他人著作中对其诗文的引用和讨论,这无疑是一项巨量的工作。在贺拉斯研究史上,这项工作是由19世纪的两德国学者Otto Keller与Alfred Holder合作完成的。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校勘过贺拉斯传世抄本,而是说前人的汇校都是很不完备和不太系统的,只是到了他们二人这里,所有传世抄本才第一次——迄今为止也是唯一一次——得到全面、详尽和系统的汇校。他们的汇校成果汇集在1864至1899年之间出版的汇校本贺拉斯全集(Q. Horati Flacci Opera recensuerunt, O. Keller et A. Holder, 两卷,莱比锡:Teubner)里。

(下转15版) ➔